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3 年第 16-17 期合刊 · 总第 832-833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左翼党的危机：谢幕之时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必须遣返被驱逐者

德国“交通灯”政府的支持率创下新低

德国城市协会反对“交通灯”政府的投资计划

哈贝克要求汽车行业增加投资

“起步机会计划”：消除课堂上的差距

艾旺格回应争议：“那不是我”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3 年 8 月 11 日~9 月 10 日）

左翼党的危机：谢幕之时

几个月来，左翼党经历了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因为它在联邦议院的议会党团可能会解散。起初，巴尔迟（Dietmar Bartsch）还能坚守自己的职位，但现在他也放弃了，这代表着议会党团的分裂似乎已不可避免。

下周一，议会党团本应选出新的领导层，但选举临时取消且被无限期推迟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份工作，也没有人会认为自己能获得多数票。其实，此时正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来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东西。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惊人的现象：年轻有为的政治家纷纷退出。43岁的法比奥·德马西（Fabio de Masi）是公认的金融政治家，但他两年前已经退出政坛。50岁的斯特凡·利比希（Stefan Liebich）和49岁的马蒂亚斯·霍恩（Matthias Höhn）于2020年自愿退出政坛，左翼党议会党团也因此失去了两位备受瞩目的外交政策专家，而这两位专家本可以让绿党与社民党之间的桥梁保持畅通。46岁的扬·科尔特（Jan Korte）自2017年以来就一直担任联邦议院左翼党议会负责人，他也不再参选。而由于选举推迟，科尔特也必须暂时留任。

他们的年龄都在40—50岁之间，政治家们经常在这个年龄向上晋升。到了50岁，经过权力斗争的磨练，就可以成为议会党团主席、国务秘书或部长。像利比希这样的左翼党改革者已经为此努力了很长时间，他们希望左翼党能够执政并成长起来。

他们为什么现在纷纷退出呢？是因为左翼党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发展壮大而对其感到失望了吗？还是因为家庭价值观代替了党员精神？又或者是因为实现自我和现实挫败感的矛盾？他们是失败者吗？

对政治感到疲劳

柏林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科尔特要把洗好的衣服晾到阳台上。上臂有纹身的科尔特是左翼党最出色的交际人才之一，他是抨击政府部门的高手，对政府的正面抨击无人能及。而现在，他也想辞职。议会负责人是一份可以牵线搭桥的工作，虽然可能无法坐到议会第一排，但如果可以像科尔特一样优秀的话，会很接近第一排。在他的离职晚会上，有来自社民党、绿党、基社盟和基民盟的政治家们，还有自民党司法部长马尔科·布施曼（Marco Buschmann），甚至还有左翼议会党团中相互敌对的小团体，科尔特几乎能和所有人打成一片。

科尔特打开一瓶啤酒，说道：“我无法忘掉这些破事。总是随叫随到，总是要交际。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不能再让电池充满电了。”然后他接着说，他的孩子们很快就会长大，需要爸爸更多的陪伴。

理由很充分。但政治方面的原因呢？与萨拉·瓦根克内西特（Sahra Wagenknecht）有关？与分裂有关？毕竟，在近年议会党团和政党的高层更替中，有一个名字总是会会出现——科尔特。但他却从未尝试过向高层攀登。不是因为希望，而是因为高层空气中氧气稀薄。他说：“如果你想登顶，就必须从众人中脱颖而出，那就需要变得更加残忍，但我并不想要这样。”

他的退出也与对政治疲劳有关。他说：“在议会或社交媒体的每次辩论中，谁会说什么，其实我事先就会知道。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瓦根克内西特，所有内容都会被审查。”

与许多其他改革者不同，他对左翼单打独斗者表示理解。他认为左翼党应该更好地照顾工会和小人物，而不是关注气候和难民问题。他还认为，左翼党的危机早在瓦根克内西特单干之前就已开始，且不会因为她的离去而结束。他赞同瓦根克内西的一些分析，但却不像她那样拥有一种保守主义的狂热。

“我从联邦议院的第一排坐到了第二排，我在政治上当然还是挺失败的。”他说，他们这群 40—50 岁的人在文化上是接近的。“实际上，我们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团队，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党派都会有争论。左翼党对社会的影响越小，内部斗争就越激烈。民众的认可度越低，你就越会认为是同侪抢走了民众对自己的认可。”

科尔特仍然是议员，也是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副主席。如果他离开的是绿党，还可以加入环境与自然保护联合会、Agora 能源转型论坛或绿色和平组织。但左翼党没有类似的组织，只有党基金会。

也许这就是左翼斗争如此无情的原因之一。因为党内所有高层都很难在不失去政治地位和薪水的情况下离开左翼党政治。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会长期留任的原因。科尔特在去留问题上犹豫不决。他表示，在离开的时刻再来仓促地提醒党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可不是一种好习惯。最好还是不提任何建议。他只想引用伟大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的一句话：“你必须喜欢人民。”因为不了解普通人，就没有左翼政治。

这句话针对的是左翼党内高度道德化的“社会觉醒”派，他们喜欢将自己与普通人的区分开来。不过，瓦根克内西特的核心政治竞争力里也不包括亲近人民的选项。

灰烬中的余烬

霍恩坐在左翼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的办公室里。四楼，一间小办公室，一张整洁的办公桌，一台电脑，两盆绿植。整洁、干净。霍恩负责管理左翼党的地产，但事情不算太多。“我有节假日、空闲周末和空闲晚上”。

他从政已有 20 年。他曾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政治家，后来进入联邦议院并担任党左翼内领导职务。2021 年，他在名单上的位置还不足以使其进入联邦议院。现在，他坐在左翼党总部的办公室里，与头号人物雅尼·维斯勒（Janine Wissler）和马丁·施尔德万（Martin Schirdewan）相隔几米。尽管如此，他对政治事务仍非常生疏。

霍恩说：“我很平静。”他想尽一切办法使左翼党适合执政。当他担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时，该党曾两次取得辉煌成就，但“社民党两次都不想与我谈判联合执政事务”。

在联邦党内，作为 2017 年大选前的执行主任，霍恩试图让左翼党与社民党、绿党结盟，结果失败了。因为他独自站在雨中，而那些真正对“红绿”联盟持开放态度的人，如卡提亚·基平（Katja Kipping）和巴尔奇，都不愿意为他撑起一把伞。

他说，“主要的错误在于改革者没有设法缩小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差距。在各州，如柏林、图林根和不来梅，都是不同党派共同执政。但在联邦中，我们从未成功与其他党进行过联合执政。”

霍恩和其他人一样，公开进行过联合执政的尝试。在 2021 年大选之前，他试图通过一份关于外交政策的文件来放松左翼党内那顽固不变的对俄政策。他希望联邦国防军能够执行蓝盔任务，就欧洲军队的建立展开辩论，并以现实的裁军政策取代对联邦国防

军的基本否定。

反对霍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左翼党内各派和领导层罕见地一致否决了他的在外交政策上的提议。他在党内受到了折磨，同时也遇到了麻烦。因为该外交政策文件，二十多位同事申请在对他提起开除党籍的诉讼。霍恩还曾提议将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 用于建设联邦国防军，1% 用于预防德国国内冲突。

几周前，仲裁委员会以毫无根据为由驳回了开除霍恩党籍的动议。

在试图改革左翼党的外交政策失败后，他又想成为左翼党的副主席。结果他输给了以“退出北约”为口号的托比亚斯·普夫吕格尔（Tobias Pflüger）。但还是有 42% 的人将选票投给了霍恩，他认为这表明“党内需要就外交政策进行辩论”，也可以说，霍恩观察未来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霍恩回顾了他一系列比较明显的政治失败，并详细追溯了事情发生的原因。这些复杂的原因在左翼党之外几乎没人能够理解。其结果是，即使在核心政治问题，即联邦治理问题上，即便是关系密切的人也会互相争斗。

霍恩的用词很谨慎，因为他是在谈论自己的雇主。对于党的乌克兰政策，党内有的人觉得应该制裁俄罗斯，但却不能给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这种优柔寡断既不利于亲俄罗斯派，也不利于亲乌克兰派。霍恩自己则很果断：“一个国家要抵御侵略者，就需要武器。”

尽管如此，左翼党仍有得到拯救的可能。左翼党目前的民调支持率为 4%。情况不会更糟了，瓦根克内希特的离任是 4% 的支持率的主要影响因素。鉴于“红绿灯”联盟的弱点，2025 年，左翼党有可能吸引绿党或社民党 2% 的失望选民。

无论如何，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以来，左翼党想要执政已经不可能了。霍恩一直想要的东西已不复存在，甚至连幻想都不可能了。

第二次生命

利比希坐在柏林潘科区的一家咖啡馆里，这里是他的主场，因为 2009 年、2013 年和 2017 年，他在潘科当选为联邦议院的直接选举议员。利比希刚刚从纽约过来，在那里，他还就职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该基金会其实是他退出左翼党后的一个选择。他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左翼党，但又离党很远。他娶了一位美国记者，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生命。

2020 年，他删除了自己作为联邦议院议员的脸书（Facebook）账户，这是一次有计划、有控制地离开的行动。利比希似乎根本不受控制，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常常显得没有太多影响力。但作为一个左翼政治家，这样的状态是必要的。经常他们会遭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攻击。

利比希是左翼外交政治家中的孤胆斗士，他倡导现实的、不那么亲俄的政策，对此他显得耐心而坚定。在外交政策方面，左翼党中像达格德伦（Sevim Dağdelen）和洪科（Andrej Hunko）这样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北约的顽固派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占大多数。“总的来说，我很感谢我在联邦议院的时光，但我没有必要再经历一次，”利比希说。

利比希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何要永远退出政治舞台。他在 22 岁时就已经是柏林市议会的议员了。他说：“四分之一世纪的职业政治家生涯对我来说已经足

够了。”他说：“当然，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就更好了。”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像东方改革者那样的人，关于欧洲和政府参与的辩论该如何进行。此外，左翼党作为反对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最低工资问题上。在2018年的议会上，他成功否决了一项亲俄动议，并谴责了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中的行动。

利比希来自东德，父母都是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人，当柏林墙倒塌时，他才16岁。对于他和许多人来说，民社党是家一般的存在。2001年，利比希帮助柏林组建了第一届红—红联盟政府。12年前，柏林墙还矗立在这座城市里。这是民社党从一个被排斥的党派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有力量的党派的第一步。

2002年，民社党被赶出了联邦议院。就像现在一样，这是一场生存危机。当时许多人认为参与执政是错误的。利比希说：“当时，我们这些对执政持开放态度的改革者被迫承担一切责任。直到那时，我对党一直都怀有很深的感情，2002年一切才平淡下来了。”

从那时起，左翼党不再是他的家人和家，变成了一个利益组织，一个没有温暖、中性的东西。

利比希批评过瓦根克内西，但并非所有的改革者都这样做了。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巴尔奇和瓦根克内西在2013年结成的联盟，即所谓的“马蹄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利比希认为这是错的。“在外界看来，左翼党不再是站在难民一边的可靠力量。我们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左翼是一个由截然不同的群体组成的联盟，例如原教旨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老左派思想家和社会运动，以及前社会民主党人和前社会民主人士。左翼党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用公式化的妥协来掩盖存在的问题，例如如何执政以及与北约的关系。

利比希反问：“如果一个决定会导致一个有效的组织的消失，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在2022年2月24日之前，左翼党内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乌克兰问题和外交政策，他们是否该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大胆的争论？”

现在，瓦根克内西阵营的分裂已经迫在眉睫。2002年以来，左翼党的议会力量日益消亡。利比希谨慎地说：“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老套，但左翼党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有时是争取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唯一力量。”摇摇欲坠的左翼党内唯一的共识是：一个没有左翼党的联邦议院是不完整的。

（编译自《日报》9月3日的新闻报道）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必须遣返被驱逐者

三周前，一位住在萨尔茨韦德尔集中安置点的男子被驱逐到希腊。现在，马格德堡行政法院对该男子做出了裁决，要求必须将其遣返回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难民委员会现已公布了这一裁决。法院认为，将这名阿富汗人从德国驱逐出境是违法的。

执行判决的期限很短，要求必须在判决生效后一周内将该男子送回德国。难民理事会与eXchange协会曾试图与萨尔茨韦德尔市政府及市长取得联系，但迄今为止，一切毫无进展，因为他们拒绝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据悉，8月11日清晨，萨尔茨韦德尔的警察和当地外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进入了当事人的房间，对其实施了驱逐，还抢走了当事人的手机。出于绝望，该男子还曾试图从

三楼窗户跳下，但没有成功。到达雅典后，他得到了当地声援团体的支持。

萨尔茨韦德尔的这一案例是欧洲庇护制度的典范。根据《都柏林条例》，已经在某个欧盟国家申请庇护的人必须留在那里等待申请结果。如果他们继续前往另一个国家，就有可能被遣返。

然而，萨克森-安哈尔特难民委员会证实，这名被驱逐出萨尔茨韦德尔的男子已经在希腊通过了庇护申请。

根据欧盟的规定，这些庇护申请已通过的人应该被驱逐到可以申请庇护的国家，但希腊不在此列。因为希腊很难满足难民基本的住宿和生存条件，难民可能会遭遇反人权的待遇和难以生存的威胁。德国法院在各种裁决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核心问题应该是，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这些难民返回希腊是否合理，当事人在希腊是否会受到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威胁。据人权组织 Pro Asyl 的说法，现在绝大多数对此事务具有管辖权的德国法院认为，该条例也适用于有工作能力的单身健康男性。

联邦内政部在答复左翼党的一个小问题时曾提及，2022年，有14053人在德国申请庇护，而他们之前已在希腊已经获得了庇护身份。其中大部分难民都来自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

2022年，联邦移民和难民局证实，83.7%“已得到承认”的难民要在德国得到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德国只提供辅助保护或防止驱逐出境的保护，而其中有1211起案件，难民局认为其当事人在希腊不会受到非人道待遇的威胁。

针对马格德堡行政法院的判决，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难民委员会表示：“不出所料，法院证实了希腊庇护制度的缺陷。”法官们认为原告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众所周知，被希腊认可的难民面临无家可归、饥饿、医疗资源短缺以及贫困的威胁。联邦议院左翼党难民政策发言人克拉拉·邦格（Clara Bünger）表示：“德国当局继续将难民驱逐到这种环境中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人道的。”

不过，联邦政府正在努力改善希腊的难民生存条件，以便将更多的人驱逐到那里。为此，柏林和雅典在2021年签署了一份改善难民生活条件的联合意向声明。据悉，德国为此还提供了5000万欧元。2022年3月，双方就项目要点达成了协议。然而，即使到了今年2月，联邦政府仍无法提供任何项目实施的具体细节。

(编译自《新德意志报》4月20日的新闻报道)

德国城市协会反对“交通灯”政府的投资计划

“交通灯”联盟鼓励企业投资并承诺对其减税，而德国城市协会对此表示反对。在内阁就所谓的《增长机会法》做出决定后，德国城市协会再次对该计划提出了批评。该协会主席马库斯·莱韦（Markus Lewe）向德国冯克媒体集团（Funke-Mediengruppe）旗下的报纸表示，该法案对各城市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如果该计划如期实施，全国各城市的税收损失将超过70亿欧元，这对它们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甚至此前，德国城市协会就曾警告称，仅在贸易税这一项上就将损失约19亿欧元。据悉，联邦内阁在勃兰登堡的梅塞贝格通过了该法案，其中包括50项与税收政策相关的措施，目的是在未来几年为经济减负320亿欧元，其核心是为气候保护投资提供优惠。目前，联邦议院正针对该法案进行辩论，只有得到联邦各州的同意，该法案才能生效。

莱韦同时也兼任明斯特市市长，他表示，各城市正面临供暖和交通转型、确保《建筑节能法》的顺利实施及气候适应等艰巨任务，如果此时联邦政府还想从各城市抽走数

十亿资金，这些任务将更难以完成。按照目前的《增长机会法》，联邦政府的举动将会对经济造成损害。正如联邦财政部在其网站上所写，该法案旨在“改善企业的流动状况并为其提供动力”，其目的是让企业能够长期投入更多资金，并拥有更多的创业勇气来进行创新。莱韦称赞了联邦政府的其他一些决定，如《儿童基本保障协议》等。但是，几项家庭政策福利的合并也意味着行政管理方面的重大变化。他要求联盟执政党尽快提交一份法律草案，以便新制度能在 2025 年前实施。

基民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也对联邦政府的计划提出了批评。他再次呼吁取消团结附加费，而不是取消《增长机会法》。默茨认为联邦各州不会同意《增长机会法》。但是他告诉冯克媒体集团的报纸：“联邦政府可以通过一个更好的方式给中小企业和工业减负，那就是立即取消团结附加税。团结附加税其实只有少数人需要支付，完全取消将是迅速帮助企业的最简单、最好的方法。如果政府真的想减轻企业负担，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与默茨和莱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成员薇罗妮卡·格里姆（Veronika Grimm）也注意到了《增长机会法》积极的一面。格里姆在接受冯克媒体集团采访时表示：“这至少是一个信号，表明政治家们已经认识到良好的框架条件对经济的重要性。但这还不够，还有许多结构性挑战有待解决，例如养老金、教育、能源供应、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扩建以及减少官僚主义等问题。”就计划中的气候保护投资溢价而言，制定明确的申请规则非常重要。格里姆说：“如果不这样做，事情很快就会变得很复杂和官僚化。”

(编译自《今日新闻》8月30日的新闻报道)

德国“交通灯”政府的支持率创下新低

“交通灯”政府的任期即将过半，德国民众如何看待目前的国内状况？德国电视一台（ARD）的“德国趋势”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德国民众对此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例如，在评估经济形势时，四分之三的德国人（73%）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不太好”或“较差”，该数据较 6 月份增加了 4%；只有四分之一的人（25%）认为德国的经济“非常好”或“较好”。

展望未来，德国民众仍然大多持有悲观情绪。近一半的德国人（46%）认为一年后的经济形势将比现在更糟，十分之四的德国人（38%）预计一年后的经济形势与现在大致相同，只有 13% 的人预计一年后的经济形势会比现在好。

经济和移民是最重要的问题

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人（28%）认为，联邦政府的政策必须优先考虑经济问题。其次是移民和难民问题，26% 的人对这一问题表示关心。调查显示，经济和移民这两大问题近几个月来越来越得到德国人的重视。4 月初，只有 7% 的人关心经济问题，现在已经增加了 21%，关心移民和难民问题的比例也同比增加了 7%。

4 月份时，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被德国人认为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但现在只有 18% 的人关心这一问题，减少了 8%。当时排名第二的是社会不公问题，六分之一的德国人（16%）对此表示关心，目前该比例增加了 3%。紧随其后的是能源政策（现在降低了 8%）、教育（现在增加了 1%）、政治冷漠（现在增加了 3%）以及乌克兰战争（现在

降低了 16%，降得最多）。

“交通灯”政府正在失去信任

从德国民众的角度来看，在上述提及的两大最重要的问题上，德国执政党的办事能力明显要比反对党弱得多。35%的人相信基民盟/基社盟最有可能推动德国经济发展（较 2021 年 9 月增加了 3%）。自上次联邦议院选举以来，民众对社民党在经济方面的信任度减半：只有 13%的人认为社民党最有能力解决经济问题（较 2021 年 9 月减少了 12%），只有 4%的人信任绿党（较 2021 年 9 月减少了 2%），而该党的领袖人物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正兼任经济部部长。

在难民和移民政策方面，与上次联邦议院选举时一样，德国民众最寄予厚望的仍是基民盟/基社盟（约 24%的支持率，较 2021 年 9 月增加了 1%），但现在紧随其后的是选择党，五分之一的选民（20%）认为该党解决难民和移民问题的能力最强（较 2021 年 9 月增加了 6%），而社民党则逐渐失去了民众的信任（约 12%的支持率，较 2021 年 9 月减少了 10%）。

在气候和环境保护方面，绿党最受德国民众信任（33%的支持率，较 2021 年 9 月减少了 15%），而社民党在社会公平方面明显领先（28%的支持率，较 2021 年 9 月减少了 12%）。不过，与上次联邦议院选举相比，这两个执政党在各自核心问题上的支持率都明显降低。

自民党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它虽然在经济政策方面失去了优势（12%的支持率，较 2021 年 9 月减少了 4%），但在税收政策方面，自民党的支持率与 2021 年 9 月相比略有上升（17%的支持率，较 2021 年 9 月增加了 3%）。在家庭政策方面，最近执政联盟内部就儿童基本保障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社民党仍捍卫了自己的领先地位（25%的支持率，较 2021 年 9 月减少了 7%），但仅略微领先基民盟/基社盟（22%的支持率，较 2021 年 9 月增加了 4%）。虽然绿党极力维护儿童的基本保障，但其在家庭政策方面的地位仍不如两年前（12%的支持率，较 2021 年 9 月减少了 7%）。

同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处理这些政治问题的人数越来越多，例如，大选前有 10%的人对经济问题持这种看法，现在则达到了 20%。在难民和移民政策问题方面，大选前有 14%的人这样认为，现在是 25%。

大多数人都支持儿童基本保障

最近，“交通灯”联盟就所谓的儿童基本保障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希望借此简化审批程序并扩大对有子女家庭的各种经济援助范围。计划中的基本金额将与现行的儿童补助金额相当。对于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联邦政府将提供额外补贴，补贴金额取决于父母的收入。总的来说，德国希望从 2025 年开始每年在该项目上增加 24 亿欧元的支出。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60%）来说，联邦政府同意引入所谓的基本儿童保障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而对于三分之一的德国人（33%）来说，这项措施的方向是错误的。绿党（84%）和社民党（78%）的支持者绝大多数都赞成这一措施。在基民盟/基社盟的支持者中，赞成票（57%）也超过了反对票（38%）。在自民党的支持者（48%:49%）和选择党的支持者（45%:49%）中，反对票超过了赞成票。

对“交通灯”联盟的满意度降至最低

根据德国电视一台（ARD）“德国趋势”的调查结果，德国民众对“交通灯”政府工作的满意度降到了自其 2021 年 12 月上任以来的新低。目前，只有 19% 的人对“交通灯”联盟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较 8 月初降低了 2%），五分之四的德国人（79%）表示“不太满意”或“完全不满意”（较 8 月初增加了 1%）。

目前，社民党的支持率达到了 16%（较 8 月初降低了 1%）。基民盟/基社盟的支持率比 8 月初提高了 2%，达到了 29%，位列第一。绿党目前的支持率为 14%（较 8 月初降低了 1%）。自民党也将略有下降，目前为 6%（较 8 月初降低了 1%）。选择党的支持率又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达到了 22%，这也是该党在“德国趋势”民意调查中的新高。左翼党的支持率仅为 4%，仍低于联邦议院的门槛。所有其他党派的支持率目前占 9%（与 8 月初持平）。

绿党正失去选举潜力

一个政党的选举潜力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衡量：“不管您实际上的投票决定是怎样的，您原则上是否会考虑给这个政党投票？”在这个问题上，在联邦议院选举结束两年后，绿党已经失去了选举潜力。2021 年 5 月，每两名合格选民中就有一人原则上会考虑投票给绿党，而现在这一比例只有 32%（减少了 18%）。基民盟/基社盟（52%，增加了 3%）和社民党（50%，增加了 1%）的选举潜力保持稳定。自民党的选举潜力为 36%（减少了 2%），目前也略高于绿党。近年来，选择党的选举潜力已增至 24%（增加了 8%）。目前有五分之一的德国民众（21%）正在考虑投票给左翼党（减少了 1%）。

那些目前仍然犹豫不决或不会去投票的选民又会选择哪些党派呢？他们更倾向于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他们几乎每两人中有一人（47%）会投票给基民盟/基社盟，45% 会投票给社民党。另外，这一群体中每三人中有一人（32%）愿意投票给自民党，每四人中有一人（24%）愿意投票给绿党，只有 17% 的人选择左翼党，14% 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党。

(编译自《今日新闻》8月31日的新闻报道)

哈贝克要求汽车行业增加投资

在慕尼黑国际车展开幕之际，联邦经济部部长哈贝克呼吁汽车制造商为加强德国的经济地位做出贡献。这位绿党政治家对冯克媒体集团的报纸说，德国作为工业基地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前列是“非常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在这里建造最具创新性、最优质和最环保的汽车”。

哈贝克说，这需要制造商做出重要的战略决策，并在未来技术上，从电池单元制造到软件开发，进行大量投资。他强调说，在这些领域里，企业具有很广阔的市场。2023—2026 年，德国联邦政府将支持汽车工业，为其提供超过 60 亿欧元的资金。

哈贝克还提到，联邦政府正在对芯片和半导体生产等方面进行战略布局，以确保供应链的安全。此外，联邦政府还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从而“促进风能和太阳能的直接电力使用”。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Hildegard Müller）曾对德国的总体状况提出批评。他说，由于过高的能源成本、税收、费用和官僚主义，德国不再具有竞争力。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 (Olaf Scholz) 即将宣布今年的国际汽车展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的主题包括气候保护、可持续出行、可持续驱动以及数字化，预计将有约 70 万参观者。

参展商包括几家中国制造商和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伴随着慕尼黑国际车展的举办，许多针对汽车行业的抗议活动也在进行中，环保人士还指责汽车行业对节能电动模型投入不够。

(编译自《时代周报》9月5日的新闻报道)

“起步机会计划”：消除课堂上的差距

本周四各州教育部部长开会时，他们还将继续讨论“起步机会计划”(Startchancen-Programm)。该计划旨在为 4000 所教学水平较差的学校提供援助，重点是提高小学教学水平和加强学生基础技能。

“起步机会计划”有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联邦政府希望通过该计划促进学习环境的结构改善；第二支柱是在 8000 所学校中设立学校社会工作常驻职位；第三支柱是向被选中的学校提供所谓的“机会预算”，学校可以对其进行自由支配，以改善教学水平、促进课外合作。

尚未快速达成一致

几个月来，四个州（汉堡、莱茵兰-法尔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州秘书一直在与联邦教育部的国务秘书萨宾·多林 (Sabine Döring) 就具体的关键点进行谈判。不过，即使他们与联邦政府达成了协议，还是需争取其他 12 个州加入“起步机会计划”。这并非易事，因为各州的情况大相径庭。有些州有社会指数，有些州则没有；有些州已经为其困难学校的项目提供了资金，有些州则没有。

政府要求各州必须共同融资“起步机会计划”，但是如何清算各州投资的金额，就如同如何对三大支柱进行资金分配一样，是充满争议的。根据目前的状况，该计划的投入资金应该 60% 由联邦政府负责，40% 由各州负责。各州坚持达成行政协议，而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则希望通过财政援助法获得更多的发言权。

如果真的按照上述方案进行资金分配，那么该投资计划甚至可能都无法在 2024 年启动，因为各联邦州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在 10 月 13 日即将召开的文化部部长会议之前，更是不可能迅速达成协议的，因为各州是否批准“起步机会计划”还取决于联邦政府是否坚持其对《数字公约 2.0》(Digitalpakt 2.0) 的资助承诺。而对于大多数州来说，《数字公约 2.0》甚至比“起步机会计划”还重要。

“所有儿童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Wübben 基金会在其根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社会指数进行的评估中指出，困难学校迫切需要真正的帮助。“我们决不能接受一些困难地区学校的儿童被置之不理。因为所有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Wübben 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声明还指出，在贫困地区，数学和德语成绩达不到最低水平的小学生的比例明显高于优势地区。2018 年对三年级学生的比较评估 (VERA-3) 结果显示，困难学校中 50%—

80%的儿童在阅读方面达不到最低标准。

新冠危机之后，困难学校的情况再次大幅恶化。2021 年对北威州的 VERA-3 评估证实，困难学校的成绩非常糟糕。然而，迄今为止，德国几乎没有任何分析将最低标准的实现情况与相关学校的情况及其学生构成联系起来。

必须分析教师的工作环境

以数据支撑的学校发展究竟有多么重要，这已经在汉堡得到了体现。德国语言学协会和德国教师协会呼吁联邦教育部部长和文化部部长切实改善学校课程中使用的数据技术。虽然德国明年将第二次参加“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并将因此获得有关托儿所就业及其所开展的教学实践的重要数据，但目前还没有计划参与这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开展的有关所有学校教学人员的研究。

德国语言学协会及其成员协会呼吁文化部长将参与 TALIS 提上日程。为了提高学校的绩效和教学质量，对教师的工作环境进行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协会指出：“从长远来看，我们还呼吁对所有年龄段的所有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教师状况进行研究。而且现在教师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必须分析和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使学校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入教学工作。”

（编译自《法兰克福汇报》9月5日的新闻报道）

艾旺格回应争议：“那不是我”

巴伐利亚州自由选民党主席兼巴伐利亚州副州长休伯特·艾旺格（Hubert Aiwanger）称自己已成为一场政治运动的目标，此前他曾因一份反犹传单备受指责。他表示：“我感觉这将断送我的政治生涯以及个人前途。”

这件事起源于 36 年前在他的书包里发现的一份恶搞的传单。他随后发表了一些声明，给人的感觉是他“十几岁时走上了厌世的道路”，他当时确实犯过错误，他对伤害了别人的感情“深表遗憾”，他明确向所有“纳粹政权的受害者，他们幸存的家属以及所有参与纪念工作的人”道歉。

但是，艾旺格说：“我曾经的这些过失现在却被用于针对我和我的政党的政治运动，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最近几天，我的形象完全被描绘成负面的。这不是我，不是休伯特·艾旺格。”

社民党副主席：辞职是唯一的选择

最近几天，这位巴伐利亚州副州长不断受到批评。基民盟/基社盟的主要政治家们今天也再次要求艾旺格必须要做出一个全面的解释。基民盟领导人默茨对冯克媒体集团的报纸说：“这件事令人不快。我不认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这的确需要一个全面的解释。”

基社盟议会党团负责人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在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闭门会议期间对德国世界频道（Welt-TV）表示，艾旺格迄今“仍然毫不松口”，这当然不符合当前的形势。当被问及他是否要求艾旺格辞职时，多布林特

说：“现在尚处于澄清问题的阶段，等他澄清之后我们才可以讨论进一步的问题。”他还表示，澄清事实是公平程序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艾旺格必须要做出解释。

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迪尔克·维泽（Dirk Wiese）要求艾旺格立即辞职。他向德国《莱茵邮报》表示：“一点一滴地暴露出来的都是艾旺格的思想观点，这种思想观点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让他辞职。”维泽告诉《莱茵邮报》，如果这位自由选民党主席继续留任的话，“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克莱因：年轻人的坏榜样

联邦政府反犹太主义专员费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表示，艾旺格的言论正在破坏德国的纪念文化。克莱因告诉冯克媒体集团的报纸：“学校和纪念馆都在努力教导年轻人以批判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纳粹主义的罪行，而这一切努力都被艾旺格破坏了。艾旺格要想对德国人犯下的最严重罪行的遗留问题采取负责任的做法，就应该积极全面地澄清自己在创作和分发这本反犹传单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显然艾旺格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抵御对他在小学生时期传播对犹太人的仇恨的指控。反犹太主义专员批评说：“他虽然已经向纳粹政权的受害者道歉了，但这是在外界施加了几天的巨大压力之后才道歉的。他一贯的做法是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形象，认为这是一场专门针对他的政治运动，并尽可能晚地、尽可能少地、尽可能缺乏同情心地发表声明，这种做法为德国年轻人做了一个很坏的政治示范。”

自由选民支持他们的政党领导人

巴伐利亚自由选民党州执行委员会、州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和州自由选民党内阁成员“团结一致”地支持艾旺格。

据《南德意志报》的报道，艾旺格在 17 岁时曾写过一篇反犹文章，他本人已经书面否认了这一点。不过，他承认曾在他的书包里发现了一份或几份反犹传单。学校随后对他进行了纪律处分。不久之后，艾旺格的哥哥承认是他写了这份传单。据德国公共电视台 ARD 的报道，艾旺格的一位中学同学说，上学期间，艾旺格有时还会在课堂上做出纳粹举手礼动作，他还开过仇视犹太人的玩笑。

艾旺格曾在社交网站“X”（前身为“推特”）上暗示，这是一场针对他的“肮脏的斗争”。这位自由选民党主席还为针对自己反犹太主义的指控进行了强烈辩护，他说：“我从来都不是反犹主义者或极端分子。我不记得年轻时有人对我提出过这样的指控，但此次事件可能是有人有不同方式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

一周后的州议会特别会议

艾旺格应尽可能全面地回答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要求其回答的 25 个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索德尔并未给他设定最后的期限。

下周四，巴伐利亚州议会将召开特别会议处理此案。州议会宣布，应绿党、社民党和自民党的要求，州议会议长伊尔莎·艾格纳（Ilse Aigner）将召开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在州选举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处理这项紧急事务。只有部分州议会成员是该委员会的成员，目前正好有五名。

巴伐利亚州将在五个半星期后选出新的州议会。目前，基社盟与自由选民党共同执政。索德尔称，尽管发生了这起事件，他仍希望继续保持两党联盟的关系。同时，他曾暗示，没有艾旺格，一切也是可以继续的。

学校不再有任何记录

艾旺格当时就读的学校可能再也无法为查明真相提供任何证据了。文化部在回应联邦政府的询问时表示：没有找到任何关于1987—1988学年处理艾旺格案件的相关文件。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离校学生的学籍信息表只保存一年。

(编译自《今日新闻》9月1日的新闻报道)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3年8月11日~9月10日）

8月15日 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BMEL）启动“社会村发展 2.0——可持续乡村强大社区建设项目”。每个项目最高可获得20万欧元的资助，为期30个月。

8月16日 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大麻控制使用和其他法规修正案》（CanG）草案。保护儿童和青少年是整个法律草案的核心内容。

8月18日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公布的数据，德国今年上半年仅批准了135200套住房的建设，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0600套，降幅达到27.2%。

8月22日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戏展“科隆国际游戏展”（Gamescom）开幕。《2023年德国游戏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德国游戏市场收入达到了98.7亿欧元，但德国本土游戏公司仅占4%。

8月23日 德国联邦政府通过《新民法》草案。该草案将简化入籍程序，也使双重或多重国籍成为可能。该草案将在德国生活后可入籍的时限从8年缩短至5年，而融入德国社会特别成功者将能够在3年后获得公民身份。

8月27日 德国联邦政府就儿童基本津贴达成协议，计划将儿童津贴、儿童公民津贴和儿童补助金等津贴统一归入儿童基本津贴，从而让更多的儿童摆脱贫困。德国联邦家庭部和财政部目前已达成协议，计划从2025年起为儿童基本津贴追加24亿欧元的资金。

8月29日 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发布了五个现代管理和数字经济项目参与计划Work4Germany，以推动行政管理数字化转型。

8月30日 德国联邦政府提出了一项包含10项要点的计划，旨在促进德国经济发展，并做出前瞻性计划，重点讨论了《增长机会法》、减少官僚主义和数字化。政府将为经济增长投入70亿欧元，并减少23亿欧元的官僚性合规成本。

8月30日 德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国家数据战略。德国数据战略的目标是实现更多数据的访问、提高数据质量，以及加强民众对数据使用的信任。涉及该战略的多项立法项目将于2024年底前实施，特别是即将通过《移动数据法案》。

9月1日 慕尼黑工大(TUM)将重新向非欧盟国家的学生收取学费。从2024—2025年冬季学期开始,根据不同课程,学士学位的学费为每学期2000欧元或3000欧元,硕士学位的学费为每学期4000欧元或6000欧元。根据2023年初生效的《高等教育创新法》,巴伐利亚州的大学可以选择是否向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学生收取学费。慕尼黑工大目前约有50000名学生,其中约30%来自非欧盟国家。

9月4日 2023年德国国际汽车及智慧出行博览会(IAA)开幕,此次主题为“体验互联移动”。德国总理朔尔茨出席了开幕式,在讲话中称赞了德国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创新能力,否认了对来自中国电动汽车竞争的担忧。他表示,德国人曾担心过与日韩汽车制造商之间的竞争,而事实证明竞争会促使德国汽车工业更好的发展。

9月5日 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向联邦议院提交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他指出,德国需要认清财政现实,让公共财政回归长期可持续。依据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德国2024年预算总额为4460亿欧元,较2023年减少6.4%,新增债务较2023年减少约300亿欧元。在政府部门中,除国防部外均面临预算削减。

9月8日 经过数月的政治争论,德国联邦议院批准了《供暖法》。399名议员投了赞成票,275名议员投了反对票,5名议员弃权。该项《建筑能源法》修正案旨在确保未来至少65%的新供暖系统采用可再生能源。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3年9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陈弢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